

20
世纪

二十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丛书

主编

陈平原

瞿秋白 / 著

陈铁健 / 导读

多余的话

Z H O N G G U O R E N 2 0 世 纪 中 国 人 的 精 神 生 活 丛 书
贵州教育出版社

拾

多 余 的 话

瞿秋白 著

陈铁健 导读

贵州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余的话/瞿秋白著;陈铁健导读. —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5

(20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10/陈平原主编)

ISBN 7-80650-440-0

I. 多… II. ①瞿…②陈…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9344 号

多余的话

瞿秋白 著 陈铁健 导读

出版发行 贵州教育出版社

社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邮编 550004)

印 刷 贵阳科海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字数 9.75 印张 240 千字

版次印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80650-440-0/I·42 定价: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厂址:贵阳市金丰路 7 号 电话:6775315 邮编:550004

“20 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丛书

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持

丛书主编/陈平原

丛书编委/孙玉石 钱理群 洪子诚 葛兆光

王守常 陈平原 朱正琳

出版统筹/朱正琳 奚晓青

装帧设计/曹琼德

责任编辑/卓守忠 卢 玫

总 序

为刚刚逝去的“20 世纪”作总结，似乎是今日中国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于崛起于艰难之际、致力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人来说，20 世纪既灾难深重，又生机勃勃。时过境迁，不管是“灾难”还是“生机”，其蕴涵的酸甜苦辣，都将成为后人咀嚼回味的不可或缺的“历史文化遗产”。

面对如此波澜壮阔的“大时代”，阅读者最好心存敬畏。不要说风和日丽，即使是斜阳余晖，也都值得论者认真鉴赏与品味。有感于此，本丛书不取大刀阔斧放言高论的姿态，而宁愿“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似乎有必要提醒笃信“进化”的国人，略为调整视线，俯下身来，流连身边的风景。对于有心人来说，一枝一叶总关情，细微处，同样可以见精神。不妨借助一本本曾经激动过一个时代的书籍的重新阅读，触摸那很可能早就被历史的风沙抹平的精神印记，体会先辈们蹒跚的足迹。

相对于有形的政治、经济乃至学术、文化的成果，一代人的“精神遗产”显得不太张扬，故很难被心境浮躁的后来者所感知。重读“旧书”，我们不只可以了解曾经有过的知识、信仰、理想，乃至具体而微的心境；更可以通过其在历史上的“存在与遗失”，理解风光无限且变动不居的世界。

与一般意义上的遴选“经典”不同，本丛书关注的是几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故必然跨越具体的学科限制，且兼及著译与雅俗。

选书的标准,在于当时以及后世的“影响力”,而不问是否“藏诸名山,传之后世”。随着时光的流逝,这种影响力可能迅速消失,也可能与日俱增,更可能时起时伏。描述如此奇妙的“书的命运”,并给予恰当而深入的解读,对于测量一个时代的思想深度与文化走向来说,也许是很好的入口处。

这里有政治家的宏愿、思想家的深思、学问家的博识、文学家的激情,以及普通人的常识与悲哀。不管是哪一类,希望均有值得述说的“接受的故事”。也就是说,书本身的魅力固然重要,可那留在历史上的“长长的影子”,同样令人怦然心动。

与书斋里的宏论不同,本丛书希望沟通专家常识与大众趣味,借“读书”回顾先辈的足迹,丰富当代人的精神感受与历史意识,故关键在于“同情之理解”,而不是判断与裁定。具体的工作策略是:将书籍本身的评介与“接受史”的叙述融为一体,并掺入个人的阅读体验。假如撰写导读的专家们之“生花妙笔”能勾起大众的阅读兴趣,使“旧书”介入“新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则功莫大焉。说到底,书,并非越新越好;人,也不一定越活越精神。这才有必要不时地回顾历史——包括阅读并未完全过时的好书。

理论上,只要是真正激动过一个时代的著作,都有可能进入我们“重新阅读”的视野。可在具体操作中,却因某种难以逾越的障碍,不能不略有回避。另外,虽然丛书的选目已经大致确定,但考虑到各位专家的写作进度,出版时无法完全依照原作的年代排列。这两点,敬请读者原谅。

本丛书作为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持的项目,并不划地自牢,而是期待更多学界朋友与我们携手,借助“读书”,重新理解并阐释 20 世纪中国人并非贫瘠的精神生活。

丛书主编 陈平原

目 录

导读：书生革命者的悲剧情怀

——外曲内直烛照心灵的《多余的话》…… 陈铁健 (1)

多余的话	(66)
唉！还不如	(91)
自杀	(92)
心的声音	(93)
新俄国游记	(105)
赤都心史	(181)
荒漠里	(270)
一种云	(276)
青年的九月	(278)
乱弹（代序）	(284)
世纪末的悲哀	(288)
暴风雨之前	(290)
骷髅杂记	(292)
透底	(296)
“儿时”	(298)
狱中诗词	(300)

导读：书生革命者的悲剧情怀

——外曲内直烛照心灵的《多余的话》

陈铁健

瞿秋白于1935年5月，临刑前一个月，在福建汀州狱中所写遗文《多余的话》，是一篇惊动海内的奇文，也是一篇令不少人瞠目结舌倍感困惑的文字，就连那些自诩为导师的人也未能读懂这篇文章。

《多余的话》问世后，与它的作者瞿秋白一样，命运多舛，遭际险恶。以其为假，否定者有之；以其为丑，咒骂者有之；以其为真为美，赞誉称颂者有之。而在邪恶的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它竟被作者当年的战友同志们斥之为“叛徒自白书”，对作者和他的先人掘墓扬灰，对尚健在的亲朋故旧以及研究瞿氏的学者们施以批判、斗争、撤职、囚禁，乃至迫害致死。这是一桩使先烈蒙冤，进而株连无辜，残害心灵，损毁文化，扼杀学术的巨大灾祸。

1980年，经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决议为瞿秋白平反，从政治上确认《多余的话》不能构成诬陷瞿秋白为“叛徒”的证据。但是，在文化上如何认识《多余的话》？从心灵上如何剖析《多余的话》？远没有达致共识。

近七十年来，人们对《多余的话》的认知和接受的过程，折射了政治与心灵的纠缠，政党伦理与人性理念的矛盾，而“文化大革

命”意识、斗争哲学一旦化为幽灵，它随时都会作祟于现实之中。

一 从瞿秋白投身于共产党说起

(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

识者指出，《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在不正常的党内斗争的政治环境中精神生活作负向运动的结果”。^①他面对残酷的党内斗争，“顺人不失己”，对邪恶势力“外服内不服”，力求保持人格的独立，个性的自由。那种外曲内直的精神生活，使对自己过分认真而又需应付外力压迫的瞿秋白活得很苦。《多余的话》首先是写给他自己，是为他的心灵而写，也是为他的亲人，也许还包括中共党内那些生前战友同志们而写。要理解这一切，还需从他投身于中共党内活动说起。

瞿秋白在中共正式建党前夕，于1921年5月在莫斯科由张太雷介绍加入共产党，属俄共（布）党组织，翌年2月正式加入中共。除担任新闻记者，报道苏俄情况外，又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任教，讲授俄文，担任理论课翻译。1922年冬，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到苏俄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瞿秋白为陈做译员，并随陈返回，参加中共中央工作，先后为陈独秀和共产国际所器重，又以其才华横溢、为人宽厚受到中共党内上下称许。他是中共早期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重要理论宣传家，并以其精通俄语、了解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事务而成为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驻华代表马林、鲍罗廷等人的助手和译员，积极参与国共合作，成为著名政治活动家。

1927年6月30日，陈独秀提出辞职，不再过问中共中央事务。7月15日，汪精卫“分共”，陈独秀秘密离汉赴沪后，即由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南昌、秋收、广州三大暴动，都在此

^① 张秋实：《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

期决定。8月，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以陈独秀为替罪羊，推卸他们指挥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指令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推举瞿秋白为中共中央第二任领导人。在此之前，斯大林于7月9日给莫洛托夫、布哈林写信，声称为了使中共由“各种人物的大杂烩变成一个真正的政党”，需要“认真建立党务顾问制度”，“让所有党务顾问在工作中形成一个整体，受中央总顾问（他也是共产国际的代表）的指导，……这些‘保姆’在现阶段还是需要的。……（顾问‘保姆’们）是把现在的这个大杂烩固定成政党的钉子”。^①随后，共产国际新任驻华代表罗明那兹取代鲍罗廷、罗易等人，充当了中共中央新一届领导人的“保姆”，瞿秋白的噩运也由此开始。

从八七会议到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瞿秋白率领中共全党奋起武装反抗国民党，开辟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道路，虽在罗明那兹指导下发生“左”倾盲动错误，但为时甚短并得以及时纠正。1928年6月，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以“刷新”中共领导人成分为由，用向忠发取代瞿秋白任中央总书记。这个工人出身的向总书记，小有聪明，武断专横，贪财好色，为所欲为，几年后被捕叛变，叩头求饶，卒被蒋介石下令处死。掌握中共中央实际领导责任的李立三，在共产国际极“左”的“第三时期”世界革命理论影响下，忘乎所以，竟在各大中心城市发动暴动，且要求共产国际和联共予以配合。此期，被留在莫斯科的瞿秋白，先是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因与斯大林、布哈林鼓吹的“第三时期”理论及过左的富农政策不合，反对联共（布）清党反托派运动对中国留学生的迫害，被撤销代表团团长职务，待命返国。李立三无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

^① 《共产党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

权威，敢于分庭抗礼，自然被认为大逆不道。共产国际派遣瞿秋白、周恩来回国解决立三路线，定下的调子是“策略错误”，瞿、周依调行事，召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制止了李立三冒险行动，稳定了局势。孰料不久，莫斯科出尔反尔，说立三错误不是“策略”错误而是“路线”错误，指责瞿秋白犯了“调和主义错误”。随即派米夫，率领王明、秦邦宪一伙来华，召集四中全会，将瞿秋白逐出中央政治局，周恩来“戴罪”留用。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莫斯科召开关于“立三路线”的批判会议，共产国际领导人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国焘、蔡和森、黄平以及李立三，竟落井下石，颠倒黑白一致将矛头指向瞿秋白，攻击诬蔑瞿秋白对共产国际耍“两面派”，是中共党内领导“小团体的首领”。1931年初到1933年底，瞿秋白仅以中共每月所付十七元生活费（相当于上海工人的中低收入）和少许稿费度日，困窘时不得不接受鲁迅的资助。三年里，瞿秋白与鲁迅一道领导上海左翼文艺运动，重返文艺园地奋力耕耘，成绩斐然。这是他自1923年弃文从政以来相对愉悦的时期。比他大十八岁的鲁迅引瞿秋白为知己，书赠“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条幅。可惜好景不长，极“左”分子掌握的中共临时中央，又以瞿秋白在党刊《斗争》上发表的不同于极左路线的若干文章为口实，诬蔑瞿秋白是“整个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以残酷手段在白区、红区、党内、军内对瞿秋白“开展最无情的斗争”。上海中央局负责人、后来叛变投敌的李竹声，挥着拳头对瞿秋白咆哮：“像你这样的人，只有一棍子敲出党外去！”极“左”的临时中央，秉承莫斯科的旨意，以莫须有的罪名，把这位在党内享有威望而又对现行路线表示异议的领袖人物，彻底打倒，以消除他在党内的影响。

瞿秋白从容地对待这一切。他像从前被撤销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长、被四中全会开除出中央政治局一样，不予争辩，

违心地全盘接受来自莫斯科和中共临时中央的无理指责。瞿秋白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即使不是从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仅仅从普通人的是非标准和道德准则来判断这一切，他也会看穿这场丑剧和悲剧的本质。瞿秋白一生的荣辱功过，可以说同共产国际密切相关。他之所以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有威望的党的领袖，是与共产国际的提携分不开的。而把他从崇高的位子上狠狠地打下来，给以种种不堪的侮辱，也是由共产国际某些领导人所扶持的王明集团干的。这件事，对瞿秋白影响极大。可以设想，当一个长期所崇拜的权威（个人或组织）原来竟是这样一副丑恶嘴脸，他所产生的失望、痛苦和鄙视，是可想而知的。他吞咽下这些苦水，不愿白白浪费精力，再与这些具有流氓气质、政客手段的家伙们周旋了。来自莫斯科和中共临时中央的反复折磨，严重地损害了瞿秋白的身心健康。从此，他几乎搁下他的健笔。后来他所写的仅有的几篇文章，大多是应景之作，是没有思想、没有异议、没有怀疑的机器产品。这不仅是为了避祸，也是更为深沉的抗争。

这场残酷斗争的结局，是驱赶被斗争者到战火纷飞、岌岌可危的江西中央根据地去。瞿秋白患有严重肺病，生活不能自理，要求夫人杨之华同行，被拒。夫妻从此诀别。这是多么残忍的阴毒的惩罚啊。在中央根据地的一年光景，瞿秋白在教育、文艺、新闻等工作方面付出很大精力，博得毛泽东、徐特立、陈毅、王稼祥、吴黎平和当地干部群众的好感。已经远离权力中心的毛泽东与瞿秋白同病相怜，时相过从。两个人有时在草坪上背靠而坐，吟诗填词，互相唱和。看到沉郁寡欢的瞿秋白，毛泽东不无幽默地问道：“你是不是又在想杨之华了？”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大退却。党政军的领导人及其家属，身健者走路，年老者骑马，患病者坐担架。身患重病又为故人熟知的瞿秋白，却被仓皇西走的、为“左”倾集团把持的中

共中央甩在了即将沦陷的赣闽地区，让他听任命运摆布，实际是听任蒋介石围剿大军的摆布。不久，瞿秋白被蒋军俘获。从1935年4月24日到6月18日的五十六天中，他以非凡的勇气和深刻的思索，写了引起后世揣测非议的《多余的话》，又以非凡的意志和智慧击破了军统、中统特工的反复劝降，然后从容就义。

瞿秋白被捕后，真正关注他命运的是鲁迅。早在3月间，瞿秋白真实身分尚未暴露时，曾化名林琪祥写信给鲁迅、周建人和杨之华。鲁迅以他丰富的阅历和经验，深知蒋介石不会放过瞿秋白，而瞿秋白也不会屈服于蒋，必将被蒋杀害。但在身分尚未暴露之前，还有营救出一线希望。鲁迅先是拟与陈望道等发起公开营救活动，未成。又通过蔡元培在官方力争保全瞿秋白生命，也未成。鲁迅交给杨之华五十元钱，杨亲自为瞿秋白缝制两条布裤，连同五十元钱寄给瞿秋白。同时托人取得铺保并租下住房，准备瞿秋白取保开释后返沪秘密居住。岂料几天后，5月11日南京《中央日报》刊载瞿秋白被捕消息。在叛徒指认下，敌人知道林琪祥就是他们长期重金（二万元）悬赏缉拿的“共党首领”瞿秋白。至此，一切营救计划都成泡影。鲁迅于5月14日写信告诉曹靖华：“闻它兄大病，且甚确，恐怕难以医好的了。”^①

瞿秋白殉难时，除万里转战途中的红军和西北苏区外，在当时的中国不可能有悼念他的文字公开问世。瞿秋白就义消息传到莫斯科后，他在俄国的朋友、同事、苏联媒体和共产国际立刻发表文章，举行纪念活动，表示深切的哀悼。共产国际举办悼念瞿秋白专号的墙报，一些领导人撰文，对这位曾任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国际反帝联盟领导成员的瞿秋白表达了深切敬意。各国共

^① 《鲁迅书信集》第963号函。它兄，它即维它，瞿秋白笔名。

产党都撰写了悼词。

1935年10月，鲁迅抱病怀痛，为瞿秋白编辑文集《海上述林》。鲁迅把对敌人的憎恨、对战友的怀念融铸在《海上述林》的筹划、选稿、设计、出版等系统工程之中。此书由鲁迅亲辟“诸夏怀霜社”出版，并亲自装帧设计，手书题签。此书堪称书林精品。1936年8月，当重磅道林纸精印蓝天鹅绒烫金本和特豪华羊皮书脊烫金本《海上述林》上卷样本从日本运到上海（排版在上海，装订在日本）时，距10月鲁迅去世仅有两月了。茅盾说：“鲁迅为了编印亡友的两卷著作，耗费了大量的心血，而这一年正是他沉痾的一年！”^①

1936年6月，瞿秋白殉难一周年时，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编辑出版中文书《殉国烈士瞿秋白》，书中辑录了杜宁（杨之华）、萧三、陈云、李立三、王明、康生等人的悼念文章，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论及苏区文化教育的一段文字，以及共产国际代表、日本、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越南共产党的悼念文字。编者在引言中说：

瞿秋白同志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最好的领导者之一，而且是中国人民最优秀的领袖之一。他毕生为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奋斗到底。当他牺牲的周年纪念日，不仅中国共产党党员，而且全中国人民都必然要纪念这位优秀的领袖。

瞿秋白就义十年之后，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地指出：

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

^① 《一九三五年记事》，《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1期。

屠刀之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直到60年代初，崇敬赞誉的花环依然伴随着瞿秋白。谁能料到，他生前的悲剧会在他殉难的二十多年后卷土重来。经济“大跃进”后，继之以政治“大革命”，弄得天怒人怨，祸国殃民，连死难烈士如瞿秋白也不能幸免呢?!

二 《多余的话》确为瞿秋白遗作 (二十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

《多余的话》最早于1935年8、9月公开节载于《社会新闻》第12卷第6、7、8期。内容是第二节《历史的误会》，第六节《文人》和第七节《告别》。《社会新闻》是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出资，由丁默村、李士群（均为中共叛徒，中统特务，抗日战争时期叛国投敌为汪伪特务）在上海创办的反共刊物。主要内容是报导中共红军和苏区的“阴暗面”，用以攻击共产党。该刊在《共魁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标题下加编者按语，其中有云：

瞿于就刑前，曾自草一书，历述本人之身世及参加共党始末，自署该册曰《多余的话》。……该书原文现保存于讯结瞿案之陆军×师司令部，而各主管机关则存有抄本，因中间甚多涉及匪军内容及匪党政策之处，在此残匪未全歼灭之前，尚不宜完全披露。本刊今得存有该件某军事机关之惠赐，摘录该书可以发表部分，公诸读者。

一年半之后，1937年3月5日至4月5日出版的《逸经》第25、26、27期，全文刊载《多余的话》。关于文稿的来源，《逸经》创办人简又文1971年在台湾《传记文学》上所写《宦海沉浮二十年》一文中说：《逸经》半月刊关于中共人物和事迹

的文章，撰稿最多的是杨幸之。杨原在福建蒋军某军任政治工作人员，曾参与对中共红军作战。常用笔名柳云。《多余的话》文稿来自杨幸之的“录寄”，杨加“引言”，署名雪华，杨先是将《多余的话》投寄《宇宙风》，因该刊主办人陶亢德不敢刊用，简又文闻讯力争，得以在《逸经》刊出。另一个看过《多余的话》文稿的赵庸夫说：“《逸经》已为之全部发表，与我当时在汀州所抄录者相比较，可以说是丝微的‘错讹’都没有。”^①

《多余的话》问世后半世纪，它一直像谜一样，让人真伪莫辨。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约三十年间，共产党人和左翼文化人等，大抵说它是伪作，至少是被国民党方面篡改过的。

1937年3月，莫斯科出版了杜宁、萧三编辑的《殉国烈士瞿秋白》一书，明确否认《多余的话》的真实性。说是“……在秋白死难以后，在反动势力压迫之下，各报所发表者，多非原稿，有些信札文件，显系敌人所伪造，故意投寄各报，以中伤秋白同志”。1950年7月18日，《人民日报》刊载臧克家《关于瞿秋白同志的“死”》一文，认为瞿秋白在狱中所写诗词等，“对于这样一个烈士的死是多么不相称！它们对他简直是一个大讽刺，一个大侮辱！这些东西决不可能出自一个革命烈士的笔下，它是敌人埋伏的暗箭，向一个他死后的‘敌人’射击。”“秋白临刑高唱国际歌，喊‘为中国革命而牺牲，是人生最大的光荣’，这才是和他雄壮的死，不朽的死合节的雄壮的诗、不朽的诗！”同日同版还刊出杨之华来信，赞同臧克家的意见。她写道：

蒋介石和被他所收买的无骨气的叛徒，为了要反对共产党，所以来污蔑瞿秋白同志。例如：秋白在狱中写

^① 《关于瞿秋白之种种》。《逸经》第34期，1937后7月20日。

的《多余的话》等等，蒋匪的爪牙从新闻记者的手中抢回去，说是未经审阅的东西不准拿出去。所谓“审阅”，就是不准暴露真实的事实，为要侮辱共产党人不屈的气节而修改秋白在狱中的作品。

先是，天津《文艺学习》杂志第六期刊登李霁野《瞿秋白先生给我所印象》一文，摘引“枉抛心力作英雄”诗，说明瞿秋白狱中心态的从容。臧克家、杨之华的文章和信件，针对李文加以驳难。李霁野在1950年7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来信，说明他征引的瞿诗“并非原文”，附从主流导向。

曾经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也曾认为《多余的话》是假的。他说：

《多余的话》，我在延安时，就从国民党的报刊上看见了。李克农同志曾问过我：“有人要把《多余的话》真迹卖给我们，我们买不买？”我当时说：“这是假的，是国民党用来瓦解我们党的。”因而决定不买。^①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党史资料》丛刊第1期载文，说是鲁迅见了《逸经》上的《多余的话》，“非常关心，他和郑振铎商量，是否可以通过关系把《多余的话》的原件调来看看。郑即设法把原件调了出来，在鲁迅家里……看后，一致认为假的，不是瞿秋白的手迹。”此事，茅盾在《一九三五年记事》中也有类似叙述，只是当事人改鲁迅为茅盾。《逸经》刊出《多余的话》半年之前，鲁迅已经逝世。茅盾所记，似乎可能。但《逸经》所刊《多余的话》，明明写着是“录寄”的文稿，哪里会是瞿秋白的手迹呢？

《多余的话》真乎？伪乎？究竟谜底在哪里呢？

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在由江西瑞金向上海转移途中，

^① 陆定一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1980年4月4日。